

“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系列



纽曼选集

[英] 约翰·亨利·纽曼 著
徐庆誉 赵世泽 戴盛虞 译

*Selected Works of
John Henry Newman*

宗教文化出版社

“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系列



纽曼选集

[英] 约翰·亨利·纽曼 著
徐庆誉 赵世泽 戴盛虞 译

*Selected Works of
John Henry Newman*

◎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纽曼选集/(英)纽曼著;徐庆誉,赵世泽,戴盛虞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7
(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

ISBN 978-7-5188-0054-4

I. ①纽… II. ①纽… ②徐… ③赵… ④戴… III. ①基督教-宗教哲学-文集 IV. ①B5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4577 号

(本书由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授权,特此致谢)

纽曼选集

[英]约翰·亨利·纽曼 著

徐庆誉 赵世泽 戴盛虞 译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07(编辑部)

责任编辑: 范振涛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5.75 印张 360 千字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88-0054-4

定 价: 68.00 元(内部发行)

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序言

金陵神学院托事部主持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盖认为将基督教两千年来的重要典籍名著译成中文,对中国基督徒思想与信仰的发展,必将大有帮助益。

这一大规模的翻译计划乃 1941 年肇议于四川成都者,由孙恩三、葛德基(Dr. Earl Cressy),及现任本编译所主任章文新(Dr.F.P.Jones)做初步计划。1942 年聘徐宝谦主持编务,惟徐君不幸于翌年因覆车遇难,工作颇受打击。

1944 年章文新自华返美,重新调整计划,由纽约协和神学院院长范都生(Dr.H. P. Van Dusen)及金陵神学院托事部主席德彬杜甫(Dr.R. Diffendorfer)约请美国神学界权威多人,商讨整个编译方针及审订所选取材料。经过多次审议,乃决定将全部材料编为三部;第一部包括自第二世纪起迄改教时期的代表作,第二部包括自改教时期起至 1880 年左右的代表作,第三部包括近代及当代的代表作。计第一部有十卷,第二部有二十六卷,第三部有三卷。每卷约请权威学者一人,负责编选材料,可能时并撰写该卷导论,致是全部计划乃告完成。托事部将这些宝贵作品献给中国教会,深信它们确能忠实地反映基督教历代的重要思想及中心信仰。

1946 年章文新重返南京,按照上述计划进行。不幸内战扩大,工作难以推进,一部分已完成译稿亦未能出版。迨 1951 年,托事部决定在美国继续此一有意义而艰巨的工作,并附设编译所于德鲁大学(Drew University, Madison, New Jersey),工作乃得恢复。编译所成立后,特约学者多人从事翻译,每一译稿均经编译所诸专任

编辑数度与原文对照,并加修正。若原作为德文、拉丁文或希腊文,则除校对英译本外,并校对原作,务求于传述原意方面达到最大限度的准确性。

金陵神学院托事部

1954 年春

序 言

《纽曼选集》为本集成所选译的重要内容之一,内容记述一位安立甘会学者兼教牧的宗教思想如何从安立甘的信仰转变到天主教的信仰。

负责选择本集成材料的编委会诸学者因鉴于纽曼在宗教思想史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故一致同意译纽曼作品为一专册,以贡献于中国学者。纽曼的自传可说是历代以来伟大的宗教传记之一,他的专编论及证道讲章亦均活泼而富有感力。

本选集材料为安立甘神学教授哈代博士(E.R.Hardy)所编选的。哈代教授对安立甘神学及安立甘教会史研究有素,且为牛津运动史之权威学者。中文翻译为徐庆誉、赵世泽、戴盛虞三位博士所分任的:徐君译第一部第一至第三章,赵君译第四第五章及附录,戴君译其他部分各篇。全书译出后经本人及本所编辑许牧世、赵世泽数度对照原文,做必要之修正,故文责由本所负之。

纽曼的某些议论可能使读者大感惊异,但就整个而论,他们宗教思想对于天主教和复原教信徒是同样有价值的。

1957年春

导 论

一

19 世纪基督教界中最成为争议人物的莫过于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man);即在今日,讨论纽曼的书籍及专论仍不断出现,而纽曼传记的作家们依然喜用“纽曼之谜”,“神秘的纽曼”,或“神秘的红衣主教”等词句作为题目,可见纽曼在历史上的地位还不容易确定,所可断言的是宗教界学者们对他的兴趣迄未稍减,正在继续不断地探索他的思想及主张的真谛,希望对他能够有更深刻的了解。

纽曼生于 1801 年,死于 1890 年,几乎是活在 19 世纪的整个世纪中。他的父亲是伦敦的一个银行家,他对儿子的教育颇知注意。纽曼 7 岁时父亲送他进私立学校,住宿校中。这时期他已显露了对文学的嗜好,喜背诵作家名句,在学习写作时特别注重文体及修辞,勤修苦读,孜孜不倦。从性格上说,纽曼是一个喜沉思而并不寡言的孩子,他的想象力极丰富,但颇近于幻想。读《天方夜谭》,往往神驰幻境,希望那些奇异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有一次他告诉同学,谓生命乃一梦境,他本人是一个天使,而世界上其他一切都是虚幻的。听见的人都觉奇异。在兴趣方面他很倾向于神秘玄奥的事物,处处表现着奇特的性格和才气;十三四岁即开始研读潘恩(Paine)和休谟(Hume)讨论信仰问题的作品,以后涉猎范围渐广,举凡奥维德(Ovid)、荷马、希罗多德(Herodotus)等名家作品,都成为他研读的对象,并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他的读书心得。此外他在校中邀集同志,办刊物,发议论,编写歌剧,早已是一个崭露头

角的学生领袖矣。

1816年纽曼转入牛津三一学院,自是以后,牛津和纽曼发生了极密切关系。一直到1845年他改奉天主教时为止,前后约30年,没有离开过牛津,当时的牛津为安立甘会学术思想的大堡垒,非安立甘的思想无以立足。1824年纽曼被封立为安立甘会牧师,1828年授职牛津圣马利堂,1831年被选任为大学讲道员。这时纽曼在牛津学者群中颇负时誉,每作证道演讲,极能吸引听众,青年学生倾慕他的议论者尤多。就在这段时期他结识了牛津学者佛饶得(Hurrell Froude)、歧布勒(John Keble)、溥西(Edward Pusey)诸人,彼此志同道合,为以后牛津运动及单张派中坚人物。1832年纽曼偕佛饶得同游意大利,翌年返国,即发动牛津运动,并出版《时论单张》(*Tracts for the Times*)。

牛津运动为纽曼宗教思想转变的主要关键,但其意义却不限于产生了纽曼之脱离安立甘会和加入罗马天主教这一后果。牛津运动及《时论单张》所代表的思想在当时确成为安立甘理论的一大威胁:客观地说,这一运动使罗马教义侵入到安立甘的系统中去,对安立甘的智识界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为安立甘大公主义及重仪派立下了基础;从另一方面说,天主教在英语国家中的所谓复兴运动往往与牛津运动相提并论,认为二者有直接的关系,可见牛津运动在宗教史上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时论单张》于1833年开始出版,以反自由主义、反理性主义、反伊拉斯都主义(Erastianism,即以教会为国家之一部门,须受制于国家的学说)等相号召。积极方面则强调教会的大公性及使徒性,强调教条、教规及教牧圣职的权威性。整个单张运动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保守的、复古的、宗法的,是19世纪自由主义精神的反动,而这一运动始终在纽曼的领导之下,以纽曼为中心。1836年纽曼兼任《英国评论》主编,力倡所谓中庸说(Via Media),主张安立甘教会应当在罗马天主教和抗罗宗这两大极端之间另辟蹊径,因为“天主教迹近腐化,而抗罗宗各派则简直是异端。”虽然如此,单张派的态度自始即明显地比较倾向于罗马,对复原教自由教会却时时表露

憎厌。1841年纽曼发表《时论单张第九十号》(单张之最后一期),以讨论安立甘的《三十九条》为主要内容,文中纽曼认为《三十九条》与罗马天主教的基本主张并不冲突,并说《三十九条》只有消极性的批评错误的价值,不能代表真理,处处表现了袒护罗马的态度。这一单张发表后,英国教会领袖纷纷表示反对,牛津主教波哥特(Bagot)迫于舆论,乃命令纽曼停止《时论单张》的发行。这些事的经过在纽曼所著《自我辩护》(*Apologia Pro Vita Sua*)一书中有颇为详尽的叙述(见本集第一部第三及第四章)。

《时论单张》停止发行后,纽曼与安立甘教会之间已有了无可补救的裂痕。从1842年4月起,纽曼即退居里特莫(Littlemore),和一些朋友及青年学生住在一起,过着一种半隐修的生活,并开始以“基督教教义的发展”为题,撰写论文。1843年他发表了一项声明,收回他此前对罗马教会所发的一切批评言论,英国教会方面对他的疑忌乃日渐加深,攻击指责的声浪来自各方,有的且公开责他为披着安立甘外衣的罗马教徒。这时期纽曼的处境恰如他1833年在地中海航程中所作那首著名的《慈光导引歌》所描写的:“经过洪涛……经过荒山空谷……”,内心的痛苦挣扎,是不难想象的。1845年10月9日纽曼正式改宗,皈依罗马天主教。这是宗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这事的背景、经过,以及对当代及以后的影响,我们将在下面作更进一步的讨论。

二

一般史家往往把19世纪描写为科学的或理性的世纪。19世纪初期的产业革命大大地提高了自然科学在学术上的地位,人们震惊于科学在产业方面的成就,和对于宇宙现象的启示之功,乃对科学有了一种新的崇拜心理,一般认为凡未能由科学加以证验或由理性加以说明的,都无价值,都不足信。与理性主义同样盛行一时的乃是伴随着法国革命而来的自由主义。当纽曼刚进入牛津的时候,自由主义思想在英国学术界已露锋芒。所谓自由主义,就当时的环境论,颇含有思想解放或抗拒

传统权威的意味,信仰自由主义者在哲学上往往倾向于个人理性的发展,着重主观思维,忽视历史传统;在政治上则崇尚自由平等,主张政府尽可能减少在人民生活上所加的限制及干预;在经济方面则鼓吹自由竞争,自由贸易。

1817年纽曼进入牛津的三一学院,初习法律,但在这方面他没有得到预期的成功。1822年他被选任为阿礼尔学院(Oriel College)院士,从事神学研究,乃立志献身于教牧工作。在这段期间内(1822—1828)对纽曼思想影响最大的有当时阿礼尔学院院长哈金斯(Hawkins)和当代安立甘著名学者惠特礼(Whately)。当时阿礼尔学院的学术思想可说是在所谓诺伊底派(Noetic Groups)的支配之下。这一派学者的自由主义气氛颇为浓厚,非但对政治及一般社会问题的主张富有自由主义色彩,即对宗教信仰问题的见解亦然。他们相信宗教信仰的歧异是无可避免的,欲寻求一种不能错误的权威来解释一切,非但不可能,亦不必要。这一派人极重视所谓思想方法及辩护方法,在与其他学派争论时往往能以缜密的思想 and 严谨的措词取胜。纽曼自己承认这一段时期对他思想上的训练极有裨益。多数纽曼传记的作者亦同意纽曼的卓越辩才及在写作方面的技巧得力于诺伊底派者颇多。

虽然如此,纽曼和诺伊底派的关系并没有深厚根基。1828年前后,他逐渐发觉他和惠特礼及哈金斯在思想上的距离愈趋愈远,甚至无法维持原有的友谊关系(详见本集第一部第一章)。这时候他在学问上的兴趣又回复到早期教父的作品;他非但对俄利根(Origen)、丢尼修(Dionysius)、革利免(Clement)等的作品有深刻印象,对教父们的高洁品格亦甚向往。许多年后他曾说使他成为天主教徒的是教父们。也在这时候他认识了佛饶得和歧布勒二人,在短时间内即成莫逆。这两人都曾担任阿礼尔学院导师,性格上和纽曼极接近。根据纽曼在《自我辩护》中所述,佛饶得是一个“多才多艺,天资极高的人”,他的性格“温和活泼,凡和他接触的人无不推崇备至”。1828至1836年间,佛饶得对纽曼的影响最大。纽曼传记作者哈劳德(C. Harrold)以这段时期作为纽曼在牛津思想转变的第二时期。关于佛饶得的宗教思想我们不妨再引纽曼的话说明:“他(佛饶得)景仰罗马教会,厌恶新教派,喜爱教阶

制度、祭司权力和充分的教会自由……他颂扬童贞，喜默念圣徒，亦相信主在圣餐中的真实临在……”(见本集第一部第二章)从上面这几句话可以看出佛饶得在信仰上是如何地接近罗马天主教的主张了。佛饶得的早逝(死于 1836 年)对纽曼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一般相信当 1841 年《时论单张》的发行遭安立甘会干预以后，假如佛饶得还活着，他可能比纽曼更早投奔罗马教会。

除了佛饶得以外，歧布勒在这一阶段对纽曼亦有巨大影响。歧布勒原是佛饶得在阿礼尔学院的导师。据纽曼所述，1828 年以前他自己颇有自由主义倾向，因此歧布勒对他很冷淡，以后由于佛饶得的关系，他们的友谊才逐渐增进，彼此有更深刻的了解。歧布勒在感情上虽不喜欢罗马教会，但他对传统及权威的尊重，和对复原派自由教会的憎厌，却与佛饶得相同。歧布勒的卓越品性和渊博学问为纽曼所非常钦佩，虽然他没有在 1845 年和纽曼一同脱离安立甘会，但他在这段期间内和在以后的牛津运动中和纽曼心心相印，并肩作战，与佛饶得及溥西等同为单张派的领导人物。这时候纽曼除担任著名的圣马利堂牧职外，并被选为大学讲道员，在牛津的地位声望都日渐增高。由于他的保守的天性和他对于传统及权威的重视；由于他对教父们作品的服膺，更由于佛饶得、歧布勒诸友在言行上、思想上所给予他的影响，纽曼对当日学术界颇具势力的自由主义和复原派自由教会的信仰，逐渐由疏远而至于深恶痛绝。这从 1829 年他写给母亲的一封信可以看出。在那封信中，纽曼表示他对于英国教会处境的忧虑；认为当时英国知识界在本质上是反教会的。他甚至于把当时在英国政治上势力雄厚的自由党，在学术上有自由主义大本营之称的伦敦大学，和那有加尔文主义色彩的浸信会，都当作是英国教会的大敌。这种抗拒自由主义潮流的思想即牛津运动的潜在动力。1832 年纽曼偕佛饶得访问罗马及西西里，当时他对天主教的教义及制度尚多疑惧，认为许多方面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对于罗马教会在某些国家政治上所表现的雄心尤深反感，但认为天主教的大公性及其对古制及传统的尊重是值得歌颂的。翌年夏天他在西西里旅次患了一场大病后，从海路返国。航程中他心里充满矛盾的疑念，看不清自己的前途，所谓“黑夜漫漫，我又远离家庭

……”正是他此时心境的确切写照。可是他暗自下了决心,回国后将挺身与自由主义者搏斗,使英国教会不至于为自由主义的洪流所吞没。

三

正如卫斯理约翰一百年前在牛津发动的循道派运动开始之时并没有脱离国教另立新派的意向,纽曼在领导牛津运动的初期,也显然无意脱离安立甘会而投入天主教;但一种运动在发展过程中所走上的方向往往不是发动该运动的人所能预料或控制的。牛津运动在本质上是 19 世纪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反动。这一运动的历史背景及其领导者的思想前面已略略提及,更具体地说,这一运动和以后单张派的重要主张可归纳为下述三点:(一)反对把教会当作国家的一部门,须受制于国家的所谓伊拉斯都主义。这一主义为当时英国自由党人所强调的,趋向极端者甚至主张宗教信仰问题的最后权威既不在教会,亦不在圣经,而在国家。牛津运动则鼓吹教会及圣礼的权威性,认为教会既非国家的产物,亦非国家权力所能解散的,国家的责任在乎支持教会,拥护教会。(二)牛津运动鼓吹尊重古制及教会传统,认为真正教会必预具有大公性及使徒性这两大条件,而教条及教规对信徒均有绝对的拘束力,因为教条乃上帝用以限制人类的骄痴无忌之理智的方法。纽曼及单张派相信那使人心灵上受煎熬磨炼的并不是肉体的欲望,而是理智上的骄傲放纵,同时认为对古制及传统的尊重可以训练信徒的顺服之心。(三)牛津运动不但排斥政治上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当时学术上流行的现世主义(Secularism),更排斥自由主义精神之侵入到宗教信仰的范围内。从这一立场出发,它反对复原教的各种改革论调,反对任何对信仰问题的非权威的解釋,反对所谓“个人判断”。纽曼及单张派诸领袖虽然都是当时安立甘的学者或牧师,但他们从来不掩饰他们对复原教自由教会的憎厌,和对罗马天主教的景仰,虽然在某些方面他们亦公开表示与罗马的不同主张。

除了上述三点之外,纽曼的所谓“中庸说”亦为初期《时论单张》的中心理论之一。这一说主张安立甘教会应当继承使徒教会和接受教父的信仰,而其地位乃介乎

罗马和抗罗宗之间的中间地位,不偏不倚。但在另一方面,纽曼却认为安立甘会之倾向抗罗宗和容忍“新教派的错误”是“很不幸的”,只是他并未曾划定了抗罗宗教义应受攻击的一个明确范围。这一时期他固然拒绝接受天主教的“不能错误”的权威,但对复原教所尊重的“个人判断”却更反对。由于他个人对理性的不信任,很自然地他逐渐倾向于对权威的崇拜。他虽不曾否认基督为教会的最高权威,但他显然不能以这一无形权威为满足,却希望有一个有形权威。这样,他原来所主张的中庸说也就逐渐失去了其中间路线的意义。1839年他发表论“安立甘教会的前途”一文,公然喊出了“路德的精神已死,希勒得布兰和罗约拉的精神犹在!”的结论(按:希勒得布兰乃教皇贵利第七原名),并对安立甘之“具有浓厚抗罗色彩”,表示失望。但到此时为止,纽曼无论在名义上或实际上仍然是英国国教中的一个重要领袖,一直到1841年他发表了《时论单张第九十号》以后,他和安立甘会的关系才真的进入了所谓“弥留”的状态中。

《时论单张第九十号》既然成为纽曼脱离安立甘会和投入罗马怀抱的主要理由,其内容如何,不能不略加介绍。这一单张原是纽曼为答复他的门生沃德(W.G. Ward)所提出“英国教会能否恢复其大公性”一问题而作的,内容涉及对安立甘基本信条《三十九条》的解释。根据纽曼的解释,《三十九条》的立场约如下述:(一)反对罗马教皇在政治上之享有最高权威地位,而非反对罗马教会的最高权威地位;(二)对天特会议所订立的信条在基本上并不反对,因此也不能说它是反天主教教义——包括炼狱、向圣徒祷告和弥撒——的;它所反对的只是罗马教会对于一般传统上的错误之未加以严厉制裁而已;(三)英国政府以《三十九条》为工具,图争取那些愿意留在天主教会,却不愿意服从罗马教皇的人。纽曼的结论是:《三十九条》只具有消极价值,缺少积极意义,更不能代表真理。

这一单张发表后在英国所引起的普遍反感确非纽曼始料之所及。单张发表的日期为1841年2月27日,3月8日即有牛津的四位学监联名发表了一封抗议书,一星期后,各院院长不及待纽曼对这抗议书的答辩,又公开发表斥责纽曼的文告,遍

贴于各学院门前。数日内几乎全国各地舆论界都纷起声讨,直指纽曼为国教叛徒,为罗马教皇奸细。平心而论,若纯粹从历史和逻辑的观点看,《时论单张第九十号》所申论的并非全无根据,其所以引起如此普遍反感的原因,据哈劳德氏的意见,乃是纽曼忽视了《三十九条》在那一时代的实际意义,和当时英国人民对它所接受的解释;忽视了《三十九条》乃是安立甘主义的脊骨,而它对于安立甘会会友之含有神圣意味,正如教皇谕令对于天主教徒之有神圣意味一样。所以对《三十九条》的批评,或对它有了超出国教当局所能承认的解释,都将被视为危害国教和破坏安立甘主义的行为。

《时论单张》终于在牛津主教的干涉之下停止出版。这事的经过纽曼在他的《自我辩护》中叙述颇详。当时他一方面替《时论单张第九十号》的立场辩护,另一方面仍表示他对英国教会的忠心,并愿服从主教命令。但这时候又有所谓“耶路撒冷主教事件”发生,更加深了他和安立甘会的裂痕。原来英国与普鲁士间正在拟议一项合作计划,根据此项计划,两国将轮流派遣主教,常驻于耶路撒冷,以保护该地区新教徒权益。主教将听令于本国教会,但须采纳《奥斯堡信条》及遵守普鲁士教会礼制。据纽曼见解:英国教会之有此议,证明了它本身“既缺少大公性,也没有使徒性,只有抗罗宗精神而已”,因为此举除了对抗罗马教会在该地区的势力外,没有其他意义;“路德精神”还留存在安立甘会里面,显然可见。纽曼一向希望英国教会纵不能完全靠拢罗马,至少当坚守中庸的安立甘主义,今竟大谬不然,不免深感失望。

除了上述单张事件及耶路撒冷主教事件外,纽曼密友,单张派重要撰稿人溥西之被牛津当局停止讲道权两年一事,亦使纽曼在精神上蒙受严重打击。溥西于1836年参加单张运动,在思想上与纽曼颇接近。当纽曼为了《时论单张第九十号》的发表被各方面攻击时,溥西公开为纽曼辩护。1843年5月,溥西在牛津基督堂证道时规避了对罗马天主教所信的“真体临在说”作正面解释,却表示圣餐的神秘性是难以了解的。大学当局认为溥西所讲论的与国教信仰相违背,乃采取停止他的讲

道权两年的处分。纽曼对这件事的愤慨已在《自我辩护》中充分表露了。

这时候纽曼心中似乎已确定了他以后所要走的道路。1843年9月18日他正式辞去圣马利堂牧职,10月又辞去阿礼尔学院院士职,但仍然住在里特莫,从事“基督教教义发展”的写作。据他以后所说,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更使他相信“罗马天主教乃是使徒教会的真正延续”。1845年10月9日他正式改宗,由意大利籍神父罗米尼(Dominic)接纳他入罗马天主教会。1846年2月23日他离开了牛津,行前两日,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你知道我是多么孤寂!‘不要记念你的民和你的父家’这一句话不住地在我耳中响着,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我是和里特莫分手了……这感觉正如向茫茫大海进发一般。”(见本集第一部第四章)

四

纽曼的改宗对安立甘会确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还不至于动摇了英国国教的根基。单张派领导人物很少跟着纽曼投奔罗马去的,连歧布勒、溥西等也都留在安立甘会原来的岗位上,形成了以后安立甘的重仪派。至于纽曼本人,从1845年改宗到1864这20年间,在天主教中的地位始终十分晦暗。1852年他被任命为在筹建中的爱尔兰天主教大学校长,并开始他那有名的关于大学教育理论的专题演讲,但人事方面给他的阻力甚多,他不能不在1856年辞职。翌年,他在友人的敦促下,从事新的英译圣经的翻译工作,但这工作又因未能获得主教们的赞助,功亏一篑。1858年他建议在牛津设一天主教分会堂,亦为曼宁(Manning)主教所反对。1860年他主编某天主教刊物,其言论不为教廷所嘉纳,被迫辞职。这一连贯的打击对纽曼确是极度难堪的,也证明罗马当局对他还没有充分的认识。一直到1864年他的名著《自我辩护》发表后,他对罗马教会的重要性才开始为教廷方面所认识。

《自我辩护》是纽曼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这书大部分是在1864年写成的。由于金斯黎(Charles Kingsley,当时英国名作家及牧师)在评论《英国通史》的一篇书评中所说的一句话:“纽曼神甫告诉过我们,诚实本身从不曾是天主教神

甫的品德”，纽曼立刻抓住机会，发表了这一部一方面替自己表明心迹，另一方面为整个罗马天主教辩护的洋洋巨著。纽曼的文学天才和写作技术在这部书中有非常卓越的表现。书出之后，风行一时。就此书的内容说，纽曼非但把他自己的宗教思想分期分段地整理出一个系统来，同时对天主教教义在当时最为复原教所反对的各点，详加辩护，不遗余力。所以这部书迄今被认为英语作品中替天主教辩护的最优良作品。又就此书在文学上的地位说，19世纪英国文坛上所谓“纽曼文体”亦因此书之出而流行一时，为英国辩论文学开了一个新纪元，至今影响未衰。本选集将此书编为第一部，即因它为纽曼最富代表性作品，值得读者的特别注意。

《自我辩护》以外，本选集第二部专论四篇，第三部证道讲章五篇，第四部摘要短论八篇，均为纽曼名作。上述作品约半数为纽曼改宗后所写，当然属于反映天主教教义及以罗马观点立论的作品。专论第三篇《基督教教理之真纯发展与腐化的对比》一文，提出了七种标志，说明天主教教理始终是在健全发展中，而无腐化或衰败现象。他所提出的“标志”即天主教教理本质上的一贯性、连续性，及持久性等。文中论及对圣母及圣徒的崇拜，认为是“对基督崇拜的补充、阐扬和发展……与崇拜基督这一基本原则是相辅相成，而非相违背的……”

对于圣经问题，纽曼改宗后亦完全接受天主教观点，认为圣经虽是由圣灵的感动写成的，然而圣经并不是唯一的启示权威。他主张教会及教会传统与圣经同为启示权威，信徒必须承认教会有权解释圣经中的真理及其奥秘，否则必难免为异端邪说所困惑。

在讨论理智问题时（参阅本集第四部第六篇）纽曼说：天主教徒都知道理智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恩物；人类须藉理智生活，正如须藉感官生活一般，可是虔诚的信徒及修士愿意自动地限制他们对理智的运用，并以崇拜及顺服之心替代理智的运用。

《人生之伟大与渺小》（本集第三部第一篇）为纽曼于1836年所发表的证道讲章，这篇讲章流传甚广，喜爱它的读者并不限于某一宗派信徒，正如他那首著名的《慈光导引歌》几乎在各宗派的歌集中都可以看到。在这篇讲章中纽曼援引雅各在

《创世记》第四十七章所说的话,“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来说明人生是如何地渺不足道,而现实世界不过是未来世界的标志和预兆,“寿数的长短,财帛的多寡,成就的大小,生活的苦乐”,都是无需重视,不值得重视的;但同时人生又是非常伟大的,它伟大,“因为今生含有来生的希望,由于有了这种希望,这又短又苦的今生就成为尊严和可贵的了;若把今生和来生隔开,它就算不得什么了。”

《第二度春天》(本集第三部第五篇)为纽曼追念 300 年前天主教在英格兰的“丰功伟业”,并悲叹它以后的没落,期待着“春回大地”,天主教得以在英国恢复其原有崇高地位之作。本讲章发表于 1852 年,正值罗马教廷在英国重建教区,封立主教之时,这时候纽曼已经是天主教徒,作品中处处流露他对罗马教会的热烈情感。当他悲叹天主教会在英格兰所处逆境时有这样的一段描写:“当时国内早已没有天主教会了,或许可以说连天主教团体也没有了……剩下来的只有这古老宗教的少数追随者,悄悄地、凄惨地流荡着,作为那过去烜赫一时的体制的遗迹而已……这些人恰像洪水泛滥过后的沙砾和被冲刷出来的岩层一般……”但他的结论却是“冬尽春来”,天主教在英国必将有“第二度春天”。他一方面安慰天主教徒在前途暗淡之时无需失望,一方面鼓励他们奋起迎接当前的复兴时机,“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地上百花开放。”这短短的一段话可以反映 19 世纪罗马天主教如何力图在英国恢复其已失势力。

《自我辩护》一书出版后,纽曼在天主教界声誉日隆,而英国各界对他亦甚尊重。1878 年他回到了阔别多年,时刻在怀念中的牛津三一学院,接受荣誉院士衔;1879 年罗马教廷封他为红衣主教;1880 年他又访问三一学院,并作证道演讲。他死于 1890 年 8 月 11 日,享年 90 岁。

许牧世

1957 年春